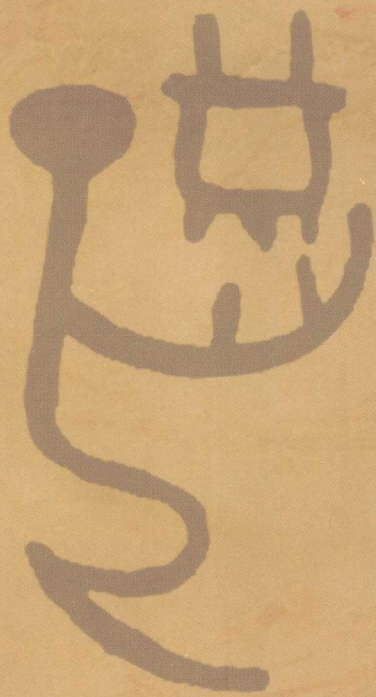


李运富 著

汉字汉语论稿



學苑出版社



汉字汉语论稿

李运富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汉语论稿/李运富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077-2995-5

I. 汉… II. 李…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②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H1-53 H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1072 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010-67674055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印 张:19.75 印张

字 数:570 千字

版 次:200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前 言

黄侃季刚先生治学极为严谨,认为“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因此以“量守居士”自称,决定“五十岁以前不著书”,在老师章太炎先生的多次敦促下,仍然说:“年五十,当著纸笔矣!”可惜黄侃五十岁即辞世,其著述多未写定,后经学生整理刊印才得以传世。

我们敬佩季刚先生的渊博学识和严谨态度,却不能仿效黄先生的做法。倒不是因为怕“重著书”而受到“吝”和“不仁”的批评^①,而是生活的环境逼迫我们不能那么做。试想,如今有的学校要求硕士生就得发表论文,博士生更是没有正式发表的论文就没有答辩的资格,在单位,评副教授要成果,评教授要专著,评硕导、博导也要若干若干的著作,所以几乎所有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都不可能等到五十岁才著书立说,实际上现在年轻的“著作等身”的“学者”大有人在。我不是圣人,免不了也要为“名利”而著述。屈指算来,已经出版过十多种独著、合著、主编或参编的著作,发表过百多篇论文了。但其中真正是不受功利因素催生的并不多,因而真正有价值的也不多。今年我五十岁,到了黄侃规定的可以真正著书立说的年龄,这时我们已经基本上不需要为功利而凑成果数了,倒是真想为学术而贡献点什么。于是决定先做两件事,一是把自己多年来有关汉字学的一些独特想法写出一部专著,二是从五十岁以前的百多篇论文中挑选出一些自己认为还有点新东西的或者有某种保存意义的编成一部论文选

^① 章太炎先生敦促黄侃著书,说:“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见章太炎为黄侃所写的《墓志铭》。

集。计划出版这两部书,真的没有多少“功利”意图,不是外在压力逼着做的,因为我不再需要申请学位,也不再需要评职称、升博导。专著还得慢慢修改,论文选集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经过近两个月收集和整理,共选出 60 篇^①,编为《汉字汉语论稿》,算是对我五十岁前不够成熟的学术历程的一个总结吧。

这 60 篇论文大致按内容安排,分为文字学、词汇训诂学、语法修辞学及综合应用四个部分;编在最后的几篇就学术内容而言当归入词汇训诂学,但形式上属书评书序性质,比较特殊一点,故专分为一类。相关内容的文章写作时间或先或后,某些观点或表述可能不一致,原则上当以时间在后的为准。为了让读者知道文章的写作背景,我在每篇文章的末尾处标明本文的原载书刊及出版时间,并根据需要略加说明。所收文章除个别内容表述上有所修改外,一般保持原样,但有明显排校错误或用字不当者则予以校正,发表时被编辑删改的如有不当也酌情补勘;原文各篇的注释位置作了统一调整,但各篇的注释格式、参考文献格式以及标题序号和例句标号等行文方面的格式改起来工作量太大,就只好参差其旧了;还有早期的一些论文在引文注释方面可能不太符合现在的规范标准,改之或有不尽。鉴于古文字字形描摹和复制的烦难,加上篇幅的限制,有几篇本来应该收入的古文字考释方面的文章最终放弃了收录,略感遗憾。文集收编过程中,博士生吴吉焯、陈灿和硕士生王小明等帮我做了部分校对工作,谨此致谢。

从 1983 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到这个论文集的出版,自己在学术的道路上摸爬滚打,已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头。回顾这一历程,每个关键的步骤都是老师扶携着我走过来的,所以如果说今天的这个论文集算得上一个小小成果的话,首先得感谢我的几位恩师。衡阳师专(今衡阳师范学院)的朱维德老师软磨硬泡、据理力争(所谓“理”就是我的综合成绩全年级

^① 有些篇是分上下两次发表的,为了方便阅读而有所整合,所以实际上不止 60 篇。

第一,他谬以为我是可造之材),花费数月的时间和精力,终于打破当时大学生分配哪来哪去、农村生源不得留城的政策僵局,把我从已经报到上课的一所县级中学给拽回母校,从而使我站在高校教师的行列,开始了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学术生涯。如果说这是我人生进步的第一个台阶的话,那第二个台阶的攀升就是在湖南师大了。作为周秉钧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在那里学习了三年,获得硕士学位。期间,李维琦老师协助周先生给了我们许多具体切实的指导和关爱。正是在周先生、李先生的教诲和敦促下,我们认真研读了《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左传》《说文》《尔雅》《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先秦经典和小学专书,作了许多读书笔记,打下了一定的文献功底。毕业之际,两位老师(还有王大年老师等)又千方百计、不惜答应委培学校的种种苛刻条件,把我这个非统招研究生留在了湖南师大工作,从而使我有了进一步提高的机会。第三个台阶则是王宁先生拉我上来的。蒙她不弃,接受我做博士生,并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决定要留我在她的身边,为此还专门给湖南师大的校长写信,商议取消我的定向合同。多年来,王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从她身上感受到强烈的继承传统学术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学到了自主创新的治学精神和系统观照的研究方法,我的许多论著里都渗透着王先生的学术思想,吸纳了王先生的无私赐予。她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什么是做学问的人。正是在她的熏陶和培养下,我这个学术领域的愣头青才得以长大并渐趋成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知不了天命,却懂得人情,知道有贵人相助,人生是何等的幸运!衷心感谢我的恩师们!

黄季刚先生曾经说过:“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凡治小学,必具常识;欲有常识,必经专门之研究始可得之。故由专门而得之常识,其识也精;由浏览而得之常识,其识也迷。盖专门之小学,持之若网在纲,挥之若臂使指;而浏览之

学,则雾中之花,始终模糊尔。”^①并且指出:“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②我的这些以往的论文,不知道有没有点“理与法”,是否“由专门而得之常识”,能不能达到“学问之道”的五项要求,自己不敢肯定,唯师友读者批评之;但我愿意在以后的治学路上谨遵黄先生的训诫,努力做一个真正的“学者”,以不辜负师长们的教诲、朋友们的鞭策、弟子们的期望。

李运富

2007年7月16日于北京昌平西湖新村

① 黄侃讲述、黄焯编定,《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 程千帆、唐文,《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李运富，1957年生，湖南衡阳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励耘学刊》（语言卷）主编、《古汉语研究》编委及全国人大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中国文字学会理事等。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科研和古文献的整理、释读工作。已出版各种著作和教材10多部（含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用》、《古汉语研究》、《语言研究》、《中国语文通讯》（香港）、《中国出土文献研究》（日本）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目 录

论“汉字起源”的具体所指	(1)
汉字性质综论	(35)
汉字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本体·系统·比较	(53)
汉字语用学论纲	(57)
论汉字数量的统计原则	(65)
从楚文字的构形系统看战国文字	
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	(70)
战国文字“地域特点”质疑	(80)
论汉语字词形义关系的表述	(96)
论出土文本字词关系的考证和表述	(105)
论汉字的字际关系	(117)
关于“异体字”的几个问题	(137)
汉字形体的演变与整理规范	(149)
论汉字结构的演变	(156)
现代形声字的判定及类义符和类声符	(168)
论汉字的记录职能	(179)
论汉字职能的变化	(195)
字理与字理教学	(210)
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	(221)
古汉语词汇学与训诂学关系谈	(234)
古汉语词汇学说略	(239)
古汉语词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47)

- “离黄”及相关语词考——“联绵词”性质略辨…………… (254)
- 是误解不是“挪用”——也谈古今联绵字观念上的差异…………… (262)
- 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解实践…………… (270)
- 论意域项的赘举、偏举与复举…………… (297)
- 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论据部分)…………… (311)
- 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证明部分)…………… (323)
- 《毛诗平议》训诂结论的检验问题…………… (333)
- 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38)
- 《左传》札记…………… (352)
- 读《尚书易解》，解《尚书·酒诰》…………… (357)
- 《尚书》《论语》札记十则…………… (366)
- “乐岁终身苦”新解…………… (370)
- 《孟子》“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疑诂…………… (376)
- “中”、“身”、“年”音义关系小考…………… (380)
- 《诗经·邶风·北风》新解…………… (387)
- 《诗经·豳风·九罭》新解…………… (392)
- 《包山楚简》“譖”义解诂…………… (397)
- 楚简“譖”字及相關诸字考辨…………… (405)
- “之”在主谓间的作用…………… (431)
- 间“之”主谓结构的语法功能…………… (437)
- 也谈“ M_1 之于 M_2 ”…………… (445)
- 《论语》里的“必也，P”句式…………… (453)
- 《左传》谓语“请”字句的结构转换…………… (457)
- 状语“请”字的意义分析…………… (467)
- 试谈使动、意动用法的归属和注释问题…………… (476)
- 使动、意动误例辨…………… (492)
- 谈怎样掌握古代汉语被动句…………… (501)
- “省略”新论…………… (508)





信息修辞论略	(530)
散文名篇《春》修辞解析疑误二则	(535)
汉语表达中的“意域项偏举”	(539)
生活中的语言困惑	(545)
试论地名标准化“语文标准”的原则问题	(555)
谈古籍电子版的保真原则和整理原则	(569)
传统语言文字学在现代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580)
佛经津梁,辞典资源	
——读李维琦先生《佛经释词》《佛经续释词》	(590)
凿通阃奥,化难为易	
——评庞月光先生《抱朴子外篇全译》	(595)
训诂材料的分析与汉语学术史的研究	
——李玉平《〈周礼〉复音词郑玄注研究》序	(600)
阐释与评论: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的必由之路	
——韩琳《黄侃字词关系研究》序	(610)

论“汉字起源”的具体所指

关于汉字的起源,学术界有对中国古代文献种种传说的继承与批判,有对地下出土的远古岩画和各种器物上的符号的种种推测,有对世界其他文字产生发展的种种理论的引进,各取所需,互相攻讦,争议不断。由于资料的缺乏,这个源远流长的问题目前还难以论定。但我们认为,众多争议的产生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料的缺乏,而是对“汉字起源”本身没有明确一致的界定,存在术语混乱、张冠李戴、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等研究弊病。如果明确“汉字起源”的具体所指,采用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多方面多角度地讨论问题,我们就能得到有关“汉字起源”的比较理性的综合认识,许多不必要的争议是可以消除的。本文拟就此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 “起源”:源出,源头,源流

要弄清楚汉字的起源问题,首先必须对“起源”进行界定,否则各人所说的“起源”含义不同,当然就很难说到一块儿去。这是导致汉字起源问题纷争不断的主要原因。

什么是“源”呢?“源”本指水源,字又作“泉”或“原(原)”、“灋”。《说文解字·泉部》:“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又《灋部》:“灋,水本也。①从灋出,厂下。原(原),篆文从泉。”徐铉注曰:“今别作源。”段玉裁注:“以小篆作原(原),知灋乃古文籀文也。后人以原代高平曰灋之灋,而别制源字为本原之原,积非成是久矣。”又引“《月令》‘百源’注曰:众水始所出为百源。单呼曰原,篆呼曰原泉。《孟子》‘原泉混混’是也。”甲骨文“原”“泉”一字,都作“    ”等形,包括表示洞穴、表示水流及水流起点共三个构件,构意为刚从山洞或地穴中流出或冒出的水流。作为“源”词,其意义包括四个成分:一是水的所出之处(“洞穴”),二是水的

① 大徐本《说文解字》此句作“灋,水泉本也”,今依段注本。

出现方式(“流”或“冒”),三是这水位于起点(“出”),四是这水正在发展(“成川”)。我们把水的出处叫“源处”,水的出现方式叫“源式”,位于起点的水叫“源头”,处于发展过程的水叫“源流”。“源处”是生出水流的母体,属别体;“源头”是水流本身的起始阶段,“源流”是水流主体的形成阶段,都属本体;“源式”是别体导出本体或别体转化为本体的方式。所以如果要追溯某条水流的“起源”,首先应该区分“源处”、“源式”、“源头”和“源流”四个概念。

洞穴之类的“源处”其实还是表象,真正生成“水体”的并不是洞穴,而是元素氢和氧。氢氧化合为“水”。这时,氢和氧是水体形成的“源素”;化合是水体形成的“方式”。“源素”及其“化合”之类的方式往往是隐性的,有时需要分析才能发现。如果某条水流是由固体的冰山溶化而来,那冰山也可以看作这条水流的“源体”,而“溶化”才是水体形成的“方式”。源素、源体、源处是针对不同情况而言的,都是水流产生之前的别体,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才能跟本体“源头”联系起来。

“源头”是水流本体的开始,经过发展形成“主流”。为了跟“源处”“源素”“源体”“源头”“源式”等命名保持一致,我们把从源头到主流的发展过程也称为“源流”。就某条现实水流的全体而言,“源头”与“主流”的关系不是单一的、等同的。“源”有“主源”(正源、远源)和“支源”(旁源、近源)之分,通常是众源一流,“源”小而“流”大。例如“长江”的上游阶段,大致是由“正源”、“南源”和“北源”三个“源头”汇合成“主流”的^①;到了中下游阶段,又有众多的支源汇入^②。有的“支源”离主流的“源头”已远,可以不看作“源头”,但也可以看作下一段“主流”的“源头”。“主流”形成后也可以分别为不同的“支流”,这时主流又成了支流的源。可见“源”与“流”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① 长江源头分为南源、北源和正源。正源以沱沱河水系为主,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西南侧姜古迪如冰川;南源以当曲、牧曲水系为主;北源以楚玛尔河水系为主。

② 这种“支源”一般叫做“支流”。据统计,长江主流拥有700多条一级支流。较大的支流大都集中在长江主流中段的“一盆二湖”地区,即四川盆地和洞庭湖、鄱阳湖。在四川盆地,从左岸汇入长江的有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右岸有乌江。洞庭湖一带的支流有清江、澧水、沅江、资水和湘江从右岸入长江,而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则从左岸汇入。鄱阳湖水系包括修水、赣江、抚河、信江和饶河,集中在长江右岸。长江下游的主要支流有青弋江和黄浦江,其长度和水量比中游的支流小。

所以,就某条水流的“起源”而言,要说明其“水流”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可以从多方面来追溯它的“源”。根据不同情况,站在不同角度,针对不同主体,可以设置“源处”、“源素”、“源体”、“源式”,“源头”、“源流”,“主源”、“支源”、“主流”、“支流”等一系列术语来分别指称水流起源的某个方面。归纳起来,又可以概括为三个范畴:一是水产生之前的有关外物,包括源处、源素、源体、源式等,可以把它们统称为“源出”;二是水产生后的初始阶段,也就是“源头”,包括主源和支源;三是从主源发展为主流的过程,也就是“源流”,涉及主流和支流等情况。

把“水源”引申泛指其他事物的源,也具有“源出”(源处、源素、源体、源式)“源头”“源流”等多个观察角度。如果是人为的事物,其“源出”范畴还可以有“源创者”,即创造某事物的人。例如说“人类的起源”,可以指人体是由父母创造的,这属于“源创者”;可以指人体是由母阴生产的,这属于“源处”;可以指人体经由十月怀胎而形成,这属于“源式”;可以指人体的构成器官和遗传基因等,这属于“源素”;可以指人类是什么东西变来的,比如说人类是由猿猴变来的,这属于“源体”;可以指人类的初期状态(或个人生命的初期),比如说原始人类(或婴儿期),这属于“源头”;可以指由原始人类发展为文明人类的过程(或婴儿生长为成人的过程),比如说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文明人(或婴儿、儿童、少年、成年)等等,这属于“源流”。

上述可见,所谓“源”的含义是很丰富的,层次不同,角度不同,对象不同,所指就不同。尽管各种事物起源的实际内涵可能不同,但多角度多层次探讨“起源”问题的方法应该是相通的。因此“汉字起源”的“起源”所指也不是单一的,实际上也可以包括“源创者”(由谁创造)、“源处”(在什么地方出现)、“源素”(用什么元素构造)、“源式”(用什么方式创造)、“源体”(形体的来源)、“源头”(最初的汉字)、“源流”(汉字功能系统形成的过程)等内容。讨论“汉字起源”问题的时候,究竟是讲所有的“源”,还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源”,应该首先明确。

二 “汉字”:汉字符号,汉字要素,汉字单位

要弄清楚汉字的起源问题,还必须对“汉字”进行界定,否则各人所

说的“字”含义不同,也是很难说到一块儿去的。

一般认为,文字是记录口语(有声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因而推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古汉字是记录古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就有,如宋朝戴侗在《六书故·六书通释》中说:“夫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以文,义与声俱立,非生于文也。”“夫文,声之象也;声,气之鸣也。有其气则有其声,有其声则有其文。……非文,则无以著其声。”“六书之义虽不同,皆以形声而已矣。”“凡六书,皆以形人声而已矣。”^①其实,这种说法只看到汉字跟汉语相适应的一面,而忽略了汉字跟汉语不相应的一面。

首先,记录语言(语音)只能以文献为据,文献产生以前的汉字跟汉语不一定有严格对应关系。在汉字的起源阶段,汉字主要用来在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与神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沟通思想,传达信息,目的并不是为了记录某一种语言。^②逐渐地,汉字会向汉语靠拢,尝试记录汉语,但初期阶段的汉字所记录的汉语是不完整的。所谓“不完整”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能准确地表达汉语的“音响形象”,甚至不记录语音,而用字形直接反映词语的“意义”或“概念”;二是不记录完整的词组或句子,而用单字或单字的聚合反映语言的焦点词或重点语义场的词汇集。所以汉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记录汉语的。这一点,王凤阳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有史以来的文字没有不是记录语言的。分清语言和文字之间的记录和被记录关系,主体和辅助关系,无疑,这会揭露文字的许多本质属性,有助于了解文字发展的许多基本规律。……但是,文字和语言究竟属于不同范畴,我们不能用从语言角度的观察代替从文字角度的观察。因为单纯从语言角度观察无法说明文字本身的许多问题。如此无法解释和语言结合前的史前文字,无法解释许多文字发展中的独特的道路,无法解释文字符号本身的变化规律。”^③可见他把“文字记录语言”限定在“有史以来的文字”,至于“史前文字”,那是不一定要记录语言的。

① 转引自党怀兴《宋元明六书学研究》,第54、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 参苏新春主编《汉字文化引论》,第17-22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③ 王凤阳《汉字学》,第1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其次,跟西方表音文字对比着来看,汉字记录汉语也不是偏重语音的。据曹念明考察^①,在国外,把文字看作记录语言的符号,首先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②,到20世纪,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说明。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这个论断的依据是借用型(他源)的希腊文字^③和当时希腊重视口语的文化背景,并不适用于其他自源文字。索绪尔在定义文字的性质(记录语言的符号性、跟语言结合的任意性)时也是以希腊文、拉丁文以及由拉丁文派生出来的各种欧洲文字为对象的,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都是借用型的、他源的、拼音式的。索绪尔说:“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我们可以把它们译成固定的视觉形象。……可以在文字中用相应数量的符号把它们唤起。……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所以“文字表现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④可见所谓“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论断原本是指记录语言的“音响形象”而言,并且文字的形体跟语言的音响形象之间的结合是“任意性”的,也就是“非象似性”的。

这些论述对于任意性强的“表音文字”是适合的,而对于汉字之类具有象似性的“表意文字”却并不完全适用。所以索绪尔明确表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型的体系。”^⑤很明显他已经看到了汉字的性质不太符合他对文字的定义

① 参苏新春主编《汉字文化引论》,第1-16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 见于亚里士多德《工具论》、《范畴篇·解释篇》等书,比较完整的表述是:“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转引自苏新春《汉字文化引论》,第5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③ 希腊文字是借用腓尼基文字改造而成的音符文字,而腓尼基文字又是采用苏美尔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结合创制的。

④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第37、4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⑤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第50-5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义,因为他知道汉字属于“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①

汉字这种不依附语音而重在“表意”的符号系统,才是“最典型的文字系统。即使在西欧,人们只要发现语言系统有所不足时,所能设想建立的真正文字系统,仍要以汉字为基本思考模型。例如笛卡尔便曾说:‘字母的不协调组合,常令读书听来刺耳。……在我们语言中听来愉悦者,德国人或觉粗俗,不能忍受’,‘语言运用于不同民族时,你们无法避免此种不便’。因此他才想到书写,云:‘若出版一本涉及所有语言的大辞典,并给每个词确定一个对应于意义而非对应于音节的符号。比如用同一个符号表示 *aimer*、*amare*、*φιλεῖν* (三个词都表示‘爱’),则有这本辞典且懂得语法者,只要查找到这个文字符号,译读成自己的语言便可解决问题了。’”^②汉字正是这样一种“对应于意义而非对应于音节的符号”。

关于汉字的特殊性,唐兰有着跟索绪尔基本一致的认识。他说:“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文字的时候,目的在写它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作语言;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③ 即使“读出来的时候”,不同的汉字可以读相同的音,而同一个汉字又可以被各种方言或异语读出不同的音,可见汉字的“记音”功能是相当低的,汉字记录汉语主要是记“词”记“义”,因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第50-5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龚鹏程《华文的特色与价值》。<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Taiwan/gong/gong-02.htm>。

③ 唐兰《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载《中国语文》1956年第1期。